

电影 · 小说

施祥生 / 著

一个都不能少

张艺谋说：

平实有时是一种永恒

张艺谋
98.10.11.
河北墙上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一个都不能少

施祥生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99·北京

施祥生 /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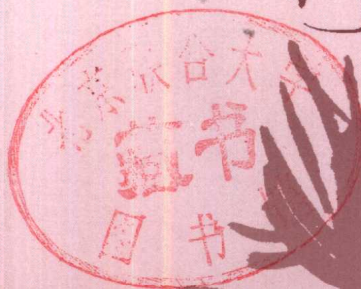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·小说

一个都不能少

施祥生

98.10.11.

河北墙上



100280



北京联大 000255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都不能少/施祥生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1999.4

ISBN 7-106-01439-7

I. 一… II. 施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0537 号

书 名	一个都不能少
作 者	施祥生
出版发行	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通州运桥宏源印刷厂
版 次	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1 字数/220 千
印 数	1—10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7-106-01439-7/I·0217
定 价	18.00 元

读过施祥生老师的几个小说,喜欢他小说里的那种真情实感和特殊的韵味,那种对生活的真诚和热望,那种平静的叙述中涌动的激情。

小说《天上有个太阳》故事简洁而动人,后来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体现了“准记录片”风格——平实、质朴、自然,我们想用这样一部电影表达生活中最质朴、最真实的情感,以此作为对“希望工程”的献礼,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种风格,也是我们的共同心愿。





走近张艺谋 / 1

一个都不能少 / 67

一个导演、一个编剧和一个女主角的故事 / 112

寻找徐老师 / 138

上海人 / 154

陷阱 / 207

上有老 下有小 / 224

黑窑 / 278

后记 / 347

走近张艺谋

与张艺谋相识、相交并合作拍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是因为我的那部《天上有个太阳》的小说。那部小说是我在新疆一个山区县完成一次采访后的有感之作，讲的是关于教师的故事，最初发表在甘肃《飞天》杂志上，不久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。张艺谋从《飞天》上看到这部小说，先让他的文学策划给我打了电话，约我去北京商量改编电影剧本事宜，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并写来信，再次邀我去北京。我是在接到他电话三个月后才赶到北京的，在北京他的那个工作室跟他见了面，后来一起去了河北赤城，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。

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张艺谋是个“怪才”“奇才”；在更多人的眼里，张艺谋是个“得奖专业户”，他总是出手不凡，接二连三地从国际上捧回奖杯，威震中外影坛，让外国人瞠目结舌。张艺谋成了一个新闻人物，对他的

议论、说法渐渐多起来了。或褒,或贬,或扬,或抑,莫衷一是。张艺谋的态度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,“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”。

但不管怎么说,你喜欢也好,不喜欢也好,张艺谋的电影是明摆着的,张艺谋捧回来的奖杯是实实在在的,张艺谋这个人更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每天工作,从一大早起干到天黑,天黑了还要干,还常常连轴转。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被耀眼的光环笼罩着的张艺谋,而很少注意那个脚踏实地在那里埋头苦干的张艺谋。张艺谋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“谜”,可张艺谋却又是实实在在的。

张艺谋说,“我是一个普通人”,甚至说自己是个“笨蛋”;

张艺谋说,我离大师的距离还很远;

张艺谋还有许多说。

.....

质朴 + 真诚 + 善思 + 机敏 + 勤奋 = 张艺谋

我是一个普通人 + 电影 + 奖杯 = 张艺谋

这前一个公式是张艺谋的一部分,这后一个公式是张艺谋的另一部分,两部分加在一起,才是一个完整的张艺谋!

从小说《天上有个太阳》 到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

1997年12月1日,我居住的那个边陲小城下了大

雪，雪是从半夜后下的，我上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，那时候外边黑沉沉的，早上起床站在阳台上，外边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

在床上躺了几天，见到窗外大雪覆盖，一片洁白晶莹，心里开朗了许多。窗外的几棵梨树的枝头上缀满白雪，正在风中轻轻地晃动，枝头上的雪花悄无声息地往下飘落，不远处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堆雪人，那个雪人很大很威武。这时，太阳光从正前面屋顶上滑过来，把个雪人映得遍体银光闪闪。我想推开窗，想透点凉意进来，可窗被冻住了，推不开，只能作罢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我转身看看墙上的钟，才刚刚十点，随口说了一句，谁的电话，刚上班，就来电话了。我当时忘了，新疆跟内地时间相差两个小时，这时候，内地已经上了两个小时的班了。

自从小说《天上有个太阳》发表后，先后接到几家电影厂和电视台表示合作的电话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我想找一个好导演把它搬上银屏，可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。但我又不愿轻易决定。

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声音显得很清脆。电话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从北京打来的，我一震。当我听明白了他打电话的意图后，又是一震。王斌在电话里说，张艺谋看了《天上有个太阳》，想把它拍成电影，问我是否跟别人合作了？如果没有跟别人合作，那就跟张艺谋合作吧。我告诉了他实情，他说那我们合作吧。我当时表示了合作的意向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王斌连着打来电话，让我到北京商

量改编事宜，当时因为身体及别的一些原因，我不能动身去北京。第四天，张艺谋打来了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对我说，拍这样一个电影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希望我能马上去北京。当得悉我暂时实在去不了时，又写了一封信寄给我。后来我们商定，由我在新疆先动手改编，双方的想法在电话里沟通。后来他又给我寄来了一大堆资料，让我参考，其中有一本是《我要读书》摄影作品集，这些资料对我后来的改编有极大的帮助，他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、中国的农村教师。

在给我打电话前，张艺谋完成了对这部未来电影的整体构思，当时我让他说说他对电影的想法时，他对我说，要面向全人类，要沟通人类共同的情感；要质朴、自然、平实，拍成一部“准纪录片”。他的这些整体设想，成了后来我改编剧本及他拍摄的一个指导思想。以后的具体操作就是按照这个基本思路进行的。

从那时起，蛰居在那个边陲小城里的我跟北京的张艺谋拉上了一根热线，他每隔两三天给我来一个电话，在电话里我们进行沟通，他的想法很具体。他给我谈中外的一些优秀电影，谈他的拍摄设想，谈某一部优秀电影的某个细节，甚至还说到自己在国外电影院里看某部影片时的感受，他是在影响我，我是一个影盲。跟一个影盲合作拍电影，无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
在张艺谋全部的想法中，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，后来的电影就是在他这两点的基础上展开的。作为一个电影导演，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体验，他对观众的观赏心理有着充分的了解。在跟我第一次通话时，他就建议将

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校长换成一个年轻的女教师，而且这个女教师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，同时他还让我把原作中民办教师转正的一个情节去掉。我当时明白了他的意图，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。但这样一来，给我的改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，主要人物一换，一个在原作中很有分量的细节一去掉，原作的影子基本就不存在了（只保留了一个进城寻找失学孩子的故事）。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在后来的一次电话里对他说了，他对我说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，之所以能打动我，是因为作品里的那种真情实感，真实、自然、朴实的韵味，但从电影的角度说，需要作大的调整，我通过《天上有个太阳》认识了你，我请你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重新写一个故事。我们想拍一个儿童故事，但不是那种成人化的儿童的故事。我知道这对于我，以及对于将来张艺谋的拍摄都有一定的难度，幸好的一点是，我有近三十年的教龄，我教过师范，我的许多学生都是在中小学里当老师，有这垫底，我这只小蚂蚁，也就“胆大妄为”了。改编得很艰苦，病魔还在折磨着我，张艺谋在那边催得又很急，我坚持着在电脑前面打，常常嘴里含着药片在电脑前打字。每每写完一稿，我就电传到北京，张艺谋以极快的速度看完，立即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读后的感觉，并具体地提出修改意见。他谈得很细很投入，这样的电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，一直到那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，他来电话让我在年初八前把第四稿电传过去，说他年初八要到美国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利用这段时间把剧本送审，送审的时间大约半个来月，他去美国也是半个月，这样正好把这段时间利用

上。我在年初三下午将第四稿电传给他。他接到电传后，来电话告诉我说，是让人打印好送审。我心里的这块石头还悬着，不知审查的结果会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听他的口气，倒是胸有成竹的。他对我说，我年初八就走了，等我回来，你就到北京来。

后来他从美国回来后，打电话来让我去北京，我当时有点犹豫，张艺谋说，我们总应该见见面，剧本有些地方还得修改。于是我咬咬牙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，艺谋告诉我说是将影片的名字改为《一个都不能少》了，我对着改后的剧本看了看，说，这个名字好，通俗有味。后来我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在一次会议上定的，那天张艺谋召集剧组开会，说到影片名字的事，他说最好换一个有点意思而又让人能接受的片名，当时就有人提了一串名字，但觉得不理想，后来有人说，干脆用里边人物的一句话，张艺谋接着说，那就叫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名字好，好上口，又有意思，给人一份存想，道出了一种时代追求。1998年9月10日，是教师节，我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写电视剧，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是他在街头看到《北京青年报》上有一个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大标题，问是不是那个电影上映了？我放下电话，走到街上，买了一份当天的《北京青年报》。那天的《北京青年报》的第四版上倒真的有一个黑体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大标题，但不是说那个电影，而是讲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和四处避水的学生如何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回到学校上课，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成了广大农村教师的共同心声。后来在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上，我又看到了这样的标题，那是说的上海支援云南

建设的同志，为边疆建设作贡献的动人故事。每每看到这样的标题出现，我都会激动不已，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可以用这几个字归结：一个都不能少。

后来，我在剧组里得到了一件T恤衫，衣服的背后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广西电影制片厂生产令：彩色故事影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剧本已经广电总局电影局、区广电厅审查通过，一致认为：主题立意好，观赏性强，可以投拍。经厂长批准，从即日起，进入筹备阶段。广西电影制片厂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”。而三月二十四日，我正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。

外景地选在河北赤城水泉村

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拍摄现场选在河北赤城县水泉村的水泉小学，那是艺谋从美国回来选定后在电话里告诉我的。

水泉村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山村，几十户人家挤在一个山坳坳里，土地贫瘠，山风硬冷。站在黄土坡上，你会觉得天地一下子小了许多。在村口的黄土坡上，有一座小学。小学只有一间破旧的教室，跟教室连在一起的还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。这是张艺谋跟剧组的几位主创人员走了许多地方才将它确定为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外景地。

张艺谋走了很多地方，费了很大劲，最后决定把水泉小学作为影片的外景地，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：其一，自然是因为剧本中的环境描写。剧本中提供了一

个破旧的农村小学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地，那个小学办学条件差，教室破旧，教学设施落后，学生人数不多，可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，却发生着一桩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水泉小学的情况跟原作中的环境描写差不多（事实上，水泉小学的条件比原作中的那所学校的条件要好些），这样的实景为拍摄提供了许多方便；其二，是由影片的风格决定的。张艺谋想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一部“准纪录片”，体现出一种“质朴、自然、平实”的风格，我还在新疆的时候，他就在电话里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，水泉小学为实现这种风格提供了一定的条件，后来的拍摄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性；其三，河北省赤城县的水泉村离北京不远也不近，这方便张艺谋活动。张艺谋在准备影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拍摄时，还在忙着歌剧《图兰朵》的导演工作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跟外界有较多的接触，这个离北京不远不近的外景地，正好便于他跟外界的联系，这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自然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还是那个水泉小学是张艺谋心目中的一个小农村小学，也是未来影片中的那个理想的小学。

我是在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和张艺谋一起到河北赤城的。是他自己开的车，同行的还有美工师曹久平、摄影师侯咏、副导演酆虹。我跟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们。从北京到赤城，只有180多公里的路，可我们却走了大半天。一路上，张艺谋跟我就剧本的修改谈了许多的想法，这些想法都体现了那部未来电影的风格。这些想法，我在新疆的时候，他在电话里曾多次对我说过，这次只是说得更具体更深刻，对主要人物性格的

发展、人物之间的关系,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共同认识。坐在后排的曹久平、侯咏对剧本的进一步修改都谈了很好的意见。山路弯弯曲曲,但没有影响我们的谈话,艺谋把车开得很稳,一边说着话,他常常只用一只手转动方向盘,另一只手在做着手势,有时甚至双手离开方向盘,做着手势,来强调说话的语势。在我看来,他是个十分健谈的人,他的脑子像一个宝葫芦,随时可以冒出许多不同凡响的点子。尽管我跟他第一次见面,却不感到拘谨,我们像老朋友似的随便说着各自的想法。艺谋说,应该面对全人类,用电影来沟通人类共同的情感。他的话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压力,也可以说是一种诱惑,纵观张艺谋拍的电影,无不是以人类的命运作为重大的主题,他关心人类的生存,关心人类的命运,以自己对社会的认识,艺术地反映生活。应该说,他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导演,他的艺术的眼光常常触及到生活最本质,他所拍摄的电影因此跟别人的电影不一样(自然更在于他表现生活的方法的独特)。几个小时很快在我们的谈话和滚滚的车轮声中流过去了。那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,这样的谈话既是愉快的,又是紧张的,我竭力记住他说的话,尤其是关于电影的一些话题,后来我们有过许多次这样的谈话,但这次谈话对我的印象是很深的。

到目的地后,艺谋召集剧组的同志开了一个短会,对工作做了安排,会一散,他又跟制片主任张振燕等继续前行。他对我说,我还得往前走,你先留在这里,明天到水泉小学去看看,接触一下那里的孩子,跟那里的李老师多谈谈。你们是同行,会有许多共同语言的。会一完,他们几

个又匆匆登车前行了。望着远去的车，我想起了到北京的头一天王斌对我说的话，艺谋只要一投入工作，就什么也不顾了。现在大概就是王斌所说的“投入工作”的状态了。这时候的张艺谋与平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

山坳坳里飘动的那面红旗

水泉小学坐落在水泉村的一座山梁上，一间教室，还有一小间办公室兼老师的卧室。全校有 30 多个学生，一位老师。那天是副导演酆虹和谢东跟我一起去的。他俩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演员，他们已经先我到水泉小学去过了，跟那里的村干部和学校的老师已经很熟悉了。那天我们的车一到村口，就围上来许多人，那位李老师第一个赶来，酆虹把我介绍给他，可能因为都是当过老师的缘故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后来酆虹又把我介绍给村里的书记认识，书记是一个典型的山里人，面孔黝黑，一脸胡子，说话声音很粗，握手的时候，我明显地触摸到他掌上的老茧。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忱，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张艺谋的名声所致。

学校前面有一块空地，是学生活动的地方，也是上体育课的操场，后来电影中的许多镜头都是在这个操场上拍的。根据剧中的规定，操场上应该有一根旗杆，学生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。我去的时候，那里还没有旗杆，我对李老师说，应该设法找一根旗杆。李老师为难地说，村里还不太容易找得到这样长的杆子。我抬头四顾，四周是苍苍莽莽的大山，山上光秃秃的，除了石头，就没有别

的什么了。但我还是说，总得要找一根旗杆。李老师说，他已经跟书记讲过了，书记答应将他家屋顶上的那根电视天线杆拿出来当旗杆。我一听，说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拿。李老师就去找书记，说了我的意思。书记正在忙别的事，说，你们自己上家里去扛。我们俩就高高兴兴地到书记家去了。

我们俩在书记家的屋梁上忙乎了好一阵，终于把那根长杆弄了下来，俩人高高兴兴地扛着回到了学校。李老师找来了一把铁锹，三两下将杆子牢牢地埋好了。我对着杆子看看，想到明天这里就会飘起一面红旗，心里就很激动。李老师也对着旗杆看看，对我说，施老师，我们现在就举行升旗仪式吧。我说，学校有红旗？他高兴地说，我已经借来了，那天酆导演来说，让找一根旗杆，说是电影里有升旗仪式，我就到乡中心学校借了一面旗子来，还每天对学生进行训练，今天你来了，正好看看，哪里没有做好，你就给我们指出来。这时候我也顾不得别的许多了，说，好，我们现在就举行升旗仪式。

李老师很快把学生集合起来，把一面有点褪了色的红旗庄重地交到一个同学手里，说，现在举行升旗仪式。学生伸出手，呆呆地看着李老师，站着不动。李老师看看那个学生，说，现在升旗。学生笑笑，“噢”了一声，一转身走了。

一会儿，学生站着整齐的队伍，眼睛一动不动看着那个手里捧着红旗的旗手，那个旗手显得十分激动，眼睛看着李老师，李老师朝他点点头，他也点点头。与此同时，班长响亮地喊，升旗仪式开始，立正——敬礼——唱